



加尔文人学思想研究

Jiaerwen Renxue Sixiang Yanjiu

程新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加尔文人学思想研究

Calvinism, Humanism & Jeremy Bentham

程新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尔文人学思想研究 / 程新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743 - 9

I. ①加… II. ①程… III. ①加尔文, J. (1509 ~ 1564) —人学—
思想评论 IV. ①C91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4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序 言

在西方文化史上，如果说 14、15 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代，17、18 世纪是理性启蒙的时代，那么 16 世纪则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宗教改革的时代。正如文艺复兴时代是属于彼特拉克、薄伽丘、波提切利、达·芬奇的，理性启蒙时代是属于洛克、牛顿和伏尔泰的一样，宗教改革时代无疑是属于路德和加尔文的。19 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曾经大力渲染路德对于近代欧洲历史的重要影响，他甚至把“英国清教、英格兰和它的议会、美国人和这两个世纪的巨大工作、法国革命、欧洲及其目前每一个地方的工作”都归功于 1521 年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上的坚定表现^①。路德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轫者，通过一场反教权的革命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从而为后来发生的反王权的英国清教徒革命（即 1640 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既反教权又反王权的法国大革命，以及争取自由的美国独立战争树立了最初的榜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把英国清教、英格兰议会、美国人在两个世纪里所完成的工作，以及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都记在路德的功劳簿上，这种说法则有失偏颇。实际上，这些历史业绩与其归功于路德，不如更加公允地归功于加尔文。正是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活动和神学思想建树，才在欧洲乃至北美大地上促成了一个真正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新教教派的诞生和发展。加尔文教不仅在尼德兰、苏格兰、英格兰、法兰西等诸多地区引发了各种形式的“清教徒革命”（包括法国的胡格诺

^① 参见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223 页。

战争),并通过乘坐“五月花”号的逃亡者在北美新大陆播下清教信仰的种子,逐渐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精神砥柱;而且还如马克斯·韦伯所论证的那样,以其勤俭清洁的新教伦理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确立了合理性的根据。此外,加尔文关于“两个国度”——属世国度(国家)与属灵国度(教会)——应该彼此独立并且相互扶助的观点,以及法国和苏格兰的加尔文忠实信徒西奥多·伯撒(Theodore Beza)、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等人的“两种誓约”理论——国王和人民对上帝的誓约以及国王对人民的誓约——所包含的“君权民授”和“主权在民”思想,都为近代西欧各国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和宪政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神学根据。一位研究者指出:加尔文教的神学思想和政治伦理为人类的自由修筑起一道最坚固的马其诺防线,“这道防线,从德国和瑞士发轫,在法国和荷兰短暂停留,随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伟大的传统,直到西渡北美,在那里发芽结实,建立起一种渗透了加尔文主义精神的自由宪政体制”。^①

尽管加尔文教在促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宪政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加尔文教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缺乏宽容精神的宗教,加尔文本人更是被一些主张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人士称为“日内瓦暴君”。加尔文关于人性全然败坏的神学观点,他那充满了浓郁神性色彩的“预定论”思想,他在一些后世作家的作品(如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与苛刻,加尔文教大本营日内瓦对戏剧、艺术等各种娱乐活动的禁绝,这一切都使人们觉得加尔文教是一个对人性欲望充满了贬抑和仇恨的宗教。尤其是加尔文亲自下令对那位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越狱前来投奔他的医生兼神学家塞尔维特的火刑判决(罪名是后者否认“三位一体”教义),以及加尔文对另一位主张宗教宽容的同事卡斯特利奥的无情迫害,更是使加尔文教背上了非人道的恶名声。这位崇高圣洁同时却严酷无情的宗教改革领袖,果真是一个只强调上帝权柄、完全不顾及人性要求的铁面判官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① 道格拉斯·F.凯利:《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王怡、李玉臻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亦请参见拙文《加尔文教的“两个国度”思想对西方宪政民主的深远影响》,载《求是学刊》2012年第1期。

加尔文无疑是以改革宗领袖的身份而被后人所认识的，但是在加尔文来到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从事宗教改革活动之前，他曾在法国接受了长达十年的人文教育和法律教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人文主义素质。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所表达的神学思想，固然极力凸显上帝的主权，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完全摒弃人的权利，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研究加尔文神学的著名学者林鸿信教授认为，“加尔文本人以及其神学，分别带有人文主义与强调上帝主权两种特色，加尔文神学将两种看来互相对立的特色调和在一起”，“由于调和了上述二种特色，可以说加尔文心目中的人，是活在上帝主权之下的人，而且是本身亦带有其主权的人”^①。正是早年的人文主义熏陶，使得加尔文注重“人的发现”，注重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的铭文“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也曾复述了这句名言），从而在其神学思想中强调对上帝的认识必须从对人自身的认识开始。加尔文与路德一样，把基督教神学的重心从上帝的超验存在和抽象本质转向了人的生存意义和现世处境，从人的天性与悔改的角度来探讨上帝的恩典与救赎。就此而言，虽然我们在《基督教要义》中随处可见上帝威严的面孔，但是加尔文神学的落脚点却始终深深地埋藏在人性基底之中。

加尔文心目中的人始终处在上帝的荣耀之下，人与上帝之间的动态关系乃是理解加尔文人学思想的重要契机。首先，人作为“上帝的形象”和受造物，其原初天性是纯洁完善的；其次，在亚当堕落之后，人的本性由于遗传而全然败坏，但是他作为“上帝的形象”仍然具有因接受上帝恩典而复苏的可能性；最后，在基督和圣灵中，人由于上帝施予的救恩而称义，通过重新恢复和弘扬“上帝的形象”而获得重生。这样一个“上帝创造——亚当堕落——基督救赎”的神学三段式，全景式地展现了人性在上帝荣耀之下的复归和提升过程。而且这个称义和重生的终曲正是在现实的生存处境中完成的，它的内在根据虽然是上帝不可变更的预定或拣选，但是它的外在确证却必须落实在世俗的职业伦理和家庭美德中。这样一来，加尔文就使基督教的神性理想直接体现在现实的生存实践中，使尘世生活成为通往天国的修道场所，使人成为上帝派驻这个世界的管家。总之一句话，使世俗生活具有了神

^① 林鸿信：《加尔文神学》，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244、245页。

圣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加尔文荣耀上帝的初衷在结果上却极大地促进了世俗世界的繁荣昌盛，加尔文贬抑人性的表象竟然导致了充分尊重人权的自由宪政体制在尼德兰、不列颠和美利坚等地的普遍确立。这恰恰印证了汤因比的那句深刻的名言：“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获。”这种吊诡的结果是如何发生的呢？程新宇博士的新作《加尔文的人学思想研究》将为大家提供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程新宇的这部学术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04年，程新宇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以加尔文人学思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毕业之后，她在从事繁忙的大学教学工作的过程中，经过长达八年的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加尔文的人学思想研究》。该书以加尔文的巨著《基督教要义》为文本依据，对加尔文的人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发掘，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加尔文人学思想的理论框架、精神实质和历史影响，尤其是精辟地阐释了加尔文人学思想的吊诡特性和辩证内涵。毋庸置疑，该书的出版将为国内学术界的加尔文研究增添一笔浓重的墨彩。

无独有偶，我所指导过的另一位博士生张仕颖也在经过长达九年的精心修改之后，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马丁·路德称义哲学研究》一书，近期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路德与加尔文，这两位16世纪最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将通过张仕颖博士和程新宇博士的这两部研究专著向当代中国人展现他们的思想风采，这不能不说是汉语神学界的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更为重要的是，路德和加尔文不仅代表了16世纪的时代精神，而且也以他们的变革活动和思想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林顿教授指出：“自第十五世纪晚期至第十七世纪，主要乃一过渡时期，一个为启蒙运动准备的时期。在此过渡阶段，人文主义、基督新教与唯理思想（及自然科学）各尽其分，以破坏中世的宇宙观，准备近世的宇宙观。”^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路德和加尔文所创立的基督新教与稍早或稍晚出现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一样，构成了宏观和长程视野中的西方启蒙文化之滥觞，为英国自然神论、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批判哲学

^① 布林顿：《西方近代思想史》，王德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如果读者能够从这个角度来阅读程新宇博士的这部著作，可能会获得更加丰厚的思想启迪。

赵林

2012年10月12日于新疆乌鲁木齐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加尔文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	(6)
第一节 加尔文所处时代背景	(6)
第二节 关于加尔文的传记作品	(16)
第三节 加尔文生平事迹概要	(19)
第四节 加尔文的皈依	(58)
第二章 加尔文的思想体系概要	(62)
第一节 加尔文的著作简介	(63)
第二节 《基督教要义》的写作过程	(71)
第三节 《基督教要义》的写作目的	(78)
第四节 加尔文思想的核心和特点	(80)
第三章 加尔文思想的人学向度	(87)
第一节 宗教人(类)学论纲	(87)
第二节 加尔文之前历史上的人学问题	(91)
第三节 人学问题在加尔文神学中的地位	(109)
第四节 加尔文人学的方法	(112)
第四章 加尔文对人性的分析(上)	(120)
第一节 加尔文论人的自我认识	(120)

第二节 人的天性纯洁完整	(127)
第三节 人的本性全然败坏	(137)
第四节 称义和重生	(149)
第五章 加尔文对人性的分析(下)	(166)
第一节 预定论的演变	(166)
第二节 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	(171)
第三节 预定论和韦伯的新教伦理观	(196)
第六章 加尔文人学和生活指南	(210)
第一节 灵性生活	(211)
第二节 俗世生活	(220)
第七章 加尔文人学的影响	(232)
第一节 加尔文人学对宗教改革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235)
第二节 加尔文人学对基督徒生活的积极影响	(243)
第三节 加尔文人学促进了政治民主和政教分离	(248)
第四节 加尔文人学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52)
结语 加尔文人学的启示	(262)
参考文献	(264)
后记	(270)

导 言

神学就是人学。无论是从无神论的立场还是从有神论的立场，这句话都可以得到理解，只是理解大相径庭而已。对加尔文神学而言，这话尤其真切。

无论是蒂利希所谓宗教体现了人的终极关怀，人只有通过深层的“意义”才能实现自我存在的真实性，还是唐君毅所谓宗教生活的核心就是要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借助人心的修养，以便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都揭示了同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神学就是人学。如果我们有耐心考察宗教的内容，也不难发现，无论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内容和仪式甚至伦理道德观有多大差异，无论它们多么不可调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如卡西尔所说，宗教“回答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申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①，这就是神学视野中的人学问题。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宗教的起源和功能，也不难发现，无论宗教被解释成对神的绝对依赖的感受还是别的什么，每种解释都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也都是一种人学。

这种马克思所谓精神的鸦片和“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至少还要存在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宗教有其社会根源、自然根源和认识根源，宗教的消亡“甚至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②。因此，今日探讨宗教神学视野中的人学，对神学和人学的认识而言，都有积极意义。

对虔诚的心灵而言，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完全可以被悬搁。事实正是这样，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在康德一劳永逸地排除掉之前，加尔文早

①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② 王兆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求是》2002年第10期，第7页。

就以“先天观念”的形式从相反的立场排除掉了,^①根本无须劳神费力去证明;与其像康德一样将神从前门赶出去,然后再从后门请进来,^②加尔文却早就直截了当地承认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上帝的本性和奥秘。路德和加尔文时代的新教神学实际上早就将对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探讨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将神学的探讨重点放在启示神学范围,放在和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困境有关的方面。加尔文和路德以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一样,将经院哲学的许多话题视为空洞、抽象、琐屑、无意义的命题而弃置一旁,更注重神学的实用性。路德只探讨灵魂得救问题,尽管加尔文神学视野要更宽一些和更高一些,也只探讨神学中对于人有益的方面。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认为神学就是为了人。这或许可以看作神学世俗化的先兆?

探讨人学问题,是有神论的视角还是无神论的视角,结论相差岂止千里?加尔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差别。他说:“除非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必不认为我们是人,而会认为我们是神。然而,一旦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开始知道自己是谁,才会产生真正的谦卑,这种谦卑包括一个人不再夸耀自己而是完全依靠上帝。”^③“只要我们的眼光不超越尘世,必然十分满足于我们的公义、智慧和美德,把自己幻想成半个神明而沾沾自喜。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把思想提高,想到上帝和他的特性,与他那理当作为我们标准的公义、智慧和力量的无上完全,那么以前冒称公义而使我们心醉的,将要被看为最大的不义;以前假冒智慧之名而蒙蔽我们的,将要被看为极端愚妄;以前看来似乎有力量的,将要被证明是最可怜的无能。

①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徐庆誉、谢秉德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卷第3章第1节。略作《要义》1:3:1,以下凡引此书,均用这种缩略形式。加尔文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地具有神的意识(Sensus Divinitatis)。在加尔文看来,上帝的存在无须证明,是知觉意识,但是每人都有这种神的意识并不等于每人都理解了上帝的本质。当代的神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和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等从他的这种神的意识中获得灵感,发展出所谓的“改革宗认识论”。参见[美]迈尔威利·斯图沃德《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周伟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巧合的是,加尔文本人也正是曾被日内瓦这个自由的城市赶出去,而后又低声下气地请回来。

③ John Calvin, *Commentar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seph Haroutunian,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 The Westminster Press, Philadelphia, Isa. 6: 5. 略作 Comm. On Isa. 6: 5, 以下凡加尔文圣经注释均采用这种通用的缩略形式。

我们所看为完全的，与神的纯洁有天渊之别。”^① 加尔文的人学固然只能放在有神论的话语体系中来谈论。然而，这样的研究结论却决非只对基督徒来说有意义，其思想的火花对无神论者而言也不是没有参考价值。况且，今天宗教和俗世的对话日益频繁，许多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神学人类学和俗世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巨大张力。人类理性是否真的不需要限制？宗教和科学如何取得某种共识或者达成某种平衡？或许加尔文关于人是上帝的管家的人学思想会提供给人们一个思考的维度。

长期以来，即便在西方，加尔文的人学也常常被误解。在我国更甚。有人认为在加尔文的眼里，人像蛆虫一样堕落败坏，一无是处；有人认为他的预定论是宿命论；有人认为他强调上帝主权使人的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义，唯有恐惧战栗或坐以待毙；有人认为他主张中世纪僧侣主义的禁欲主义；有人认为他主张君主专制等。^② 然而，我们仔细研究加尔文的人学就会发现，加尔文人学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对自我的肯定，对俗世生活的肯定。这种肯定不但完全扭转了中世纪天主教传统的价值观，而且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现代性的开端。^③

加尔文强调的是在上帝面前，基督徒应自我否定，因为人腐化堕落，本性全然败坏，在上帝面前人无善可陈，因此，基督徒应该谦卑。但是，在俗世生活中，加尔文强调一般（普遍）恩典，强调理性的价值，强调人

① John Calvin,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lated by Henry Beveridg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8, vol. 1, chapter 1, section 2. 略作 Inst. I: 1: 2. 以下凡引此书，均采用这种通用的缩略形式。

② 参见 Counts, W. M., "The nature of man and the Christian's self-Esteem,"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 No. 1 (1973): 38 - 44; Clinebell, H. J., *Mental Health Through Christian Community*, New York: Abingdon, 1965, pp. 49 - 50. 他们都认为宗教，特别是宗教人类学对人的自我形象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都引用一些加尔文谈到的堕落境况中的人的状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加尔文神学中人的自我形象是消极悲观的、否定的。

③ 查尔斯·泰勒也持这种观点。事实上查尔斯·泰勒认为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性的钥匙之一，是“现代文明的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它奠定了我们当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基础，这种政治学极为关心福利问题；与此同时，它也强化了我们的世纪最有影响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即把人作为生产者加以歌颂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人类生命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连同其关于忍受痛苦的重要性的结果，改变着我们有关什么是对人类生命完整性的尊重的全部理解的色彩。伴随着把核心地位赋予自律，它也就界定了这种要求的版本，而这是我们的现代西方文明所特有的”。而这一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就是始于路德而成就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神学的后果。参见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和其他被造物相比而言的高贵。而且,根据加尔文的理论,真正基督徒都确信自己已经被拣选,这种对理性的肯定和对被拣选的确信其实就是自我肯定。加尔文明确指出,基督徒今生的生命也是有价值的,是上帝的恩赐,应该为荣耀上帝而不断完善自己,走在成圣的正道上,最后会继承天国的产业;基督徒是上帝的管家,应该尽心打理上帝的宝藏,而不是滥用上帝所赐之物,将来要向上帝交账;基督徒在俗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响应上帝的呼召,世俗的工作具有神圣的价值,没有什么职业是卑贱的工作;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为人准备的,基督徒可以合法享用,只要出于对上帝的感恩之心,不必良心不安,但是不可过分沉溺于享乐,以致忘却了自己的责任和人生的目的;人要学会支配物,而不要让物来奴役,成为追求财富和享受的奴隶。总之,加尔文的神学人类学不是叫人逃避现实,而是要以荣耀上帝为目的,充满热情和责任感地投身于现实。我们如果不将加尔文对上帝的律法面前的人和俗世标准面前的人的状况区别看待,如果不将加尔文对堕落之后和拣选之前的处于罪的状态的人和堕落之前以及被拣选蒙恩之后的人的描述区分开来,就容易得出加尔文否定人的结论。但是现实中,对于基督徒而言,完全堕落的状态是不存在的,正如因为亚当的堕落,人在被造时天性的完整已经不存在了一样,因为基督徒已经蒙恩,而且在今生已经开始了重生的旅程。这正是加尔文对基督徒的肯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肯定的神学基础。

在加尔文看来,上帝是仁慈的父,他既有绝对的主权又借着基督不断宽恕信徒的罪。这样基督徒在上帝的手里,虽然像孙悟空总也跳不出如来的掌心,但是可以尽情地跳,自由地跳;上帝何其伟大!人何其渺小!人怎么可能跳出上帝的手心呢?但人为什么要跳出上帝的手心呢?跳出了上帝的手心才是危险的,就像一个孩子,脱离了父亲的视野必然危险,在父亲的视野之中才安全。但这并不等于说基督徒没有自由。其实得到恩典就意味着重拾自由。^①上帝的儿女可以尽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做错了可以得到父上帝的宽恕,只要是出于对父上帝的荣耀和对别人的爱,而不是出

^① 但是,在加尔文看来,这个圣灵更新了的意志不再是人自己的意志,因为蒙拣选者是圣灵的殿。所以,归根结底,堕落以后,人就没了意志自由。在加尔文看来,自由是一种能力,是可以同等地作出善恶选择的能力。我们可以联系斯宾诺莎、黑格尔直到马克思关于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自由观来理解加尔文的自由。

于一己的私利。这种被拣选的确信，这种内心的安全感，本身就是心灵最大的自由。而不知自己最终命运如何的人，再怎么任性胡为，心灵都是恐惧战栗的，担心自己最后会遭到上帝的审判，只有自愿而没有自由可言。路德的精神苦困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加尔文用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路德和加尔文非常重视的基督徒的自由，其实就是基督宗教信仰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路德和加尔文神学就是通过“信”达到了这种心灵的自由。

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是宗教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共同关注的。人有灵魂和肉体，二者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格分裂或者道德虚伪。天主教有否定肉体、抛弃尘世生活的理想，甚至靠隐修、鞭笞等方式来表示肉体的罪恶，但最终却导致灵魂向肉体妥协，导致道德虚伪。正如海涅所说，基督教消灭肉体的理想和人类的本性过于矛盾，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实现，于是天主教最后变成了上帝和魔鬼，即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一种妥协，通过这种妥协，在理论上宣布了精神的独裁统治，同时又让物质在实践中行使一切被剥夺了的权利。^①“上帝确实禁止某种享乐，但人们有办法向他寻求妥协”^②，而赎罪券正是这种肉欲横行而精神成为傀儡的纪念碑。正因为强调灵肉对立、鄙视肉体，天主教反而使信仰沦为肉欲的奴隶，使宗教堕落为政治的工具。加尔文通过对俗世生活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对立，达到了灵与肉的和谐。尽管他认为上帝的形象是灵魂，但是肉体也有上帝的光照；他既肯定属灵的生活，也肯定属世的生活。他认为尘世生活也是上帝赐福，通往天国的路在某种程度上在现世已经开始了；基督徒的修道不应躲在修道院里，也不是靠对肉体的自我折磨，相反这种不充分利用上帝的恩赐的行为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有可能遭到惩罚。基督徒应通过不断悔改和响应上帝的呼召，把整个世界变成修道场。所以，基督徒固然要默念来生，但是同样要善用今生。

^① 参见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第一章

加尔文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

第一节 加尔文所处时代背景

一 加尔文时代欧洲的宗教状况

加尔文所处时代欧洲的宗教和社会状况可概述如下。

天灾人祸：继 1347—1358 年的鼠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之后，战争又使欧洲雪上加霜。

教会危机：教会正经历着大分裂。先是两教皇对峙，继而是三教皇分立。虽然康斯坦茨（Constance）基督教会议结束了这场对抗，但混乱之后，罗马教廷的威望大大削弱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宗教异端崛起。如威克利夫及其弟子们，英国的罗拉家族（Lollards），波西米亚的胡斯。第二，教皇的政治意图、贪婪野心以及以教皇为中心的谎言昭然若揭。宗教会议的主教们对此进行了揭露，宣布基督教公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其权力应高于教皇。第三，教会信徒们人心惶惶。当时人们纷纷传说，自教会大分裂之后，再无人可升入天堂。千禧年之说又卷土重来，四处可见。例如 1513 年降临节，一名天主教方济会的修道士警告佛罗伦萨人民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请他们忏悔。在德国，甚至有人肯定，敌基督者已经到来。希尔特（Jean Hilten）甚至预告教皇将于 1514—1516 年间完蛋，罗马将要被摧毁，有很多人相信他。

代为祈祷：基督徒认为，为了让神息怒，为了让自己的来世有保障，只有求人代为祈祷，或者祭祀、膜拜诸神和圣母，或者对慈善事业捐赠